

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理论与人民美好生活构建

李 洋

摘 要: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时间的本质乃是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持续展开,人通过自身的“积极存在”不断地塑造时间,并由此拓宽自身的“发展空间”,塑成自我“生命尺度”,最终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且富有意义。当前,我们所要构建的美好生活正是要让人民群众在物质满足基础上生活得更加丰富全面,更加意义突出。因此,就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而言,马克思的时间理论仍处于一种在场状态,具体表现在:美好生活的层次跃升要求必须树立人对时间的主体性地位;美好生活的内涵拓展要求必须致力更多自由时间的生成;美好生活的人本取向要求必须使时间的利用更加充分且富有意义。要想构建人民美好生活,就必须把握时间的属人本质,夯实美好生活的物质根基;转化时间的样态与结构,打开美好生活的多维面向;突显时间的超越性意涵,深化美好生活的价值归旨。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时间;美好生活;物质基础;生命尺度

中图分类号: A811.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9)03-0001-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3.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1](P4)},到了十九大,美好生活更是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在此背景下,美好生活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重大课题。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对美好生活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对美好生活的出场依据和现实背景的阐发。有论者指出,美好生活的提出是由人民群众的需要的转变引起的^[2],是人们从以往较为单一的物质性需要向更多更新的复合型需要转变的结果^[3]。第二,对美好生活的实质要义和价值期许的分析。有论者认为,美好生活的追求与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十分契合,它所重点强调的是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精神需要的满足和每个人的发展^[4],美好生活的建设过程实际就是人民群众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过程,是不断向善向美,向着幸福前进的过程^[5]。第三,对美好生活的实现机制和制度安排的探讨。有论者认为,建设美好生活重点是要加强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供给,形成包括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制度产品、政策产品在内的涉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所有领域、所有方面需要的供给体系^[6],要在经济上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社会治理上变革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在政治上建构起切实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度保障体系^[7]。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把握美好生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策略提供了思路,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好生活的实现策略上,现有研究多侧重于产品的供给和制度的保障等客体性维度,而较少涉及人的主体性维度。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仅在于外部条件的满足,更在于人们有时间、有机会去充分享有这些条件,当下全社会关于“四天半工作制”和“996工作制”的高度关注就是这一点的鲜明体现。可见,对时间的占有和享用构成了美好生活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共享发展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研究”(18BKS037)

作者简介: 李洋,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上海 201620)

实现的主体性方面。只有抓住了时间，才能在保证物质丰裕的前提下使人们获得更多闲暇和自由，从而在“既有钱又有闲”的条件下过上美好生活。鉴于此，开启美好生活实现的时间之维研究，有助于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人民美好生活，从而为其实现指明现实道路。

一、马克思社会时间理论的三重维度

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时间就一直是人们苦苦思索的重要问题。从赫拉克利特所认为的“时间是纯粹的变化”^{[8](P21)}到奥古斯丁指出的上帝“创造了一切时间”^{[9](P241)}，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时间是“运动的数”^{[10](P125)}到近代牛顿的经典物理学时间，人们理解时间的参照要么是抽象的本原，要么是绝对的运动，要么是全能的上帝，“惟独没给人一个切实的位置”^{[11](P523)}。对于此类撇开了人的现实存在和活动来谈论时间的做法，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他看来，那脱离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而存在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有也只是“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12](P222)}，它们既无力说明任何人类社会历史问题，也无法对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提供启示。而为了克服传统时间理论的抽象性和无根性，马克思创造性地将时间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3](P532)}。也就是说，时间既不是纯粹的一般物质运动的形式，也不是主观想象的结果，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生产、生活过程的展开与持续，是以实践为根基不断生成的社会时间，实践构成了时间的源泉和本质。

首先，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区别于以往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对时间问题的考察从未越出人和人的实践这一地平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立足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向我们阐明了时间的本质及其展开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吃、喝、住、穿等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因此一切都必须以“必须能够生活”和“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2](P531)}为起点，而鉴于人的需要本身是一个动态系统，所以人的生产活动也必然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正是在这一前后相继、永不停歇的生产过程中，时间的序列才显现出来，人才获得了时间的经验，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2](P529)}，当然也构成了时间的基础。由此，马克思就使时间与人的实践发生了本质关联，时间不再是自在自然的均匀流逝，也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人通过自身实践不断创造自我物质生活条件的过程，是人自身所从事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的展开，它随着人的活动的展开而不断将过去扬弃在自身内部，同时生成现在并走向未来。在深刻体悟到这一点之后，古尔德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时间的起源”^{[14](P47)}。

当马克思以实践来理解时间，人和时间的关系就从简单的服从与适应关系变成了建构和形塑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不是全然遵照时间均匀流逝的铁律来安排自身活动的，而是根据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来安排时间并成为利用时间的能手，时间也不只是标记顺序性与持续性的线轴，它的每一个瞬间和每一个片段都因承载着不同的人类活动内容而变得不尽相同且意义不凡。正是因为这种意义上的不同，时间才褪去了过去那种同质化、连续性的直线性意象，而变得充满起伏和变化，变得有时机和机遇可言。当一段时间结束以后，它并不会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或像奥古斯丁所说的仅留存于我们的记忆当中，而是凝结为空间化的物的形式，即以劳动成果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物作为过去的结果使人的生活需要在质和量上获得满足，并以此为基点不断开辟新层次新领域，不断开启未来。可见，时间的本质就是人通过实践对“当下现实”的改变并追求自身美好生活的过程。

其次，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在揭示了时间的实践性本质之后，马克思又以人的具体活动形式为依托，以人的现实生活为面向，将时间进一步地细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既包括宏观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又包括微观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休闲娱乐时间、政治生活时

间、文化生活时间等。通过这些不同的时间样态，马克思为我们描画了一幅人们生产生活的全景图，使人的生活方方面面直观、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在此多样化的时间样式中，人的各方面需要和享用的实现、满足以及拓展均获得了现实的基础，更为紧要的是，人自身也在时间的发生中使自己的肌肉、神经、大脑等得到全面的锤炼和强化，使人的各方面潜能得到激发，从而为以后更好、更高层次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时间归结为人的发展空间。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看，时间的样式越是多元，人的发展空间也就越广阔。在人类社会早期，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此时人的生命时间主要以必要劳动时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为生存而生产”构成了时间的主要方面，换句话说，人除了生存必需以外再无其他可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现，人在必要劳动之外逐渐产生了剩余，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生成了剩余劳动时间，而这些剩余劳动时间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它给人“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15](P215)}，使人得以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较为“高级的活动”。由此一来，人的活动就从物质领域拓展到了精神领域，从生产领域拓展到交往领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生活的维度与内涵，使人的生活告别了单调和贫乏，变得多姿多彩、趣味横生。可见，时间的结构变化为人的发展创造了诸多之可能，使人可以掌握和运用既有的物质力量，驾驭那“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16](P330)}，从而突破现有的生活状态，进入更加完善和美好的境界。

再次，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海德格尔曾指出，人是“终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17](P192)}，死亡是不可替代的，是人无法摆脱的属性，而人的生命长度则通过时间加以标记。确实，时间构成了人的生命有限性的表达，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命不仅仅在于量的表达，更在于质的确认，因为人的生命总是关乎价值和意义，人总是试图冲破有限的生命世界而去开创无限的意义世界。因此，时间作为人的生命尺度，它所衡量的不仅是人的生命长度，更是人的生命厚度。在马克思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者的时间完全以劳动时间的形式呈现出来，完全是“受制或者是受制于他人”的，所以马克思说他们的生活还“不如一头役畜”^{[18](P70)}，他们有的只能是“名义人生”而非“实际生命”。而要想获得“实际生命”，则必须有赖于与劳动时间不同质的自由时间的获得。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自由时间指的是“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是完全供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自由时间里，人的活动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胁迫和强制，但却也不是漫无目的和毫无章法的，它所遵循的至高无上的目的就是造就更好的自己，从而散发出强烈的“属己性”、“为我性”和“自由性”。通过人的自由活动，一方面将使得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成长为个性十足、独一无二的主体；另一方面，还将使人在与他人的交流中获得启发、承认、肯定和尊重，从而不断得到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使自己的生命变得富有意义且厚重。而在马克思看来，以上这些才是真正的人生财富和生活价值所在，财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具有创造力的全面发展的人，而自由时间作为人的发展的现实基础自然成为衡量财富和生命的尺度，“财富（现实的财富）……是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9](P197)}。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一个人占有自由时间的宽度就代表了其生命发展的厚度。

二、美好生活的内在规定与社会时间的在场

当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点来理解时间，时间就获得了无比鲜明的社会性质，它不再是“抽象地飞掠而过”，而是被人的活动所建构的时间，并与人的生存、发展以及自由实现紧密相连。而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显然是当下构建人民美好生活所必须涉及与涵盖的，美好生活就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并以追求人的生存、发展以及自由的圆满统一作为最高目的。正是从这一关联性上出发，我们说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离不开时间这一人类生存

与发展的基础性维度，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理论仍然保持一种在场状态。

首先，美好生活的层次跃升要求必须树立人对时间的主体性地位。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于美好生活的创造和实现而言，高质量的物质文化需要构成了其首要的内容。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实际上早就有所洞见：“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2](P527)}，美好生活也就无从谈起。那么，高质量的物质文化资料究竟如何才能得来，难道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某一时间点就自行达到的结果吗，是靠“坐等”和“被给予”来实现的吗？当然不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关键是充分发挥了人对时间的主体建构作用。我们不仅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来谋求发展、搞建设，更是对时间加以系统的规划和有效利用，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从“抓紧时间干”、“抢时间很重要”^{[20](P129)}到“要把握时间节点”^{[21](P3)}的提出，这些都是驾驭时间的最鲜明体现。可以说，正是基于人对时间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充分体认，以及对时间属人性和为我性特质的深刻把握，我们的跨越式发展才最终成为可能。

新时代条件下，要想为人民群众创造出更丰裕、更优质的物质文化条件，从而将美好生活由蓝图变为现实，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贯彻马克思“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的理论观点，立足于时间的实践本性并积极有所作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22](P30)}，而不能驰于空想、矜于虚声，更不能在时间面前做一个“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22](P32)}。这就昭示着，我们一方面必须要以自身的积极实践来建构时间，使时间由无内容的抽象变成承载无限丰富内容的人类活动过程，并最终凝结成各种财富形式；另一方面更要紧紧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23](P8)}，撸起袖子加油干，通过自身体力和智力的充分发挥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倍增。只有当人对时间处于一种主体性在场的时候，才能植根于过去的成就，并立足于“当下”建构“未来”，人民美好生活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

其次，美好生活的内涵拓展要求必须致力更多自由时间的生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条件下的美好生活除了包含更高要求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一基础维度外，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24](P11)}等方面内容。这就意味着，人民群众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已经不单单局限于基本的物质满足上，而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开拓自我生活的面向，使生活超出生产领域而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全方位铺展开来。而就人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生活的实现而言，它们的满足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支撑，还要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和产品供给为保障，可除了这两点，仍有一个十分必要的前提，那就是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果缺少了时间的维度，一切都将变得无从谈起。尤其是在社会发展加速、竞争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可以目睹一些人虽然占有大量财富但却无暇关注自身，亦无法体会生活之美好。由此，我们说美好生活的内涵拓展所折射出的实际是人们对自由时间的生成以及由此带来的时间结构的改变的祈盼。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坚持马克思“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的理论观点，以自由时间的不断生成和人的发展空间的不断扩大来保证美好生活的多方面内涵得以全面展开。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即整个社会时间结构的变化和自由时间的生成会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进而威胁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其实不然，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人们从生产领域抽出身来并转向生活的其他领域时，由此带来的将是个人能力的全方面激发与增强，在这一过程当中，人将打破原有的生命状态，并逐渐锻造出“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9](P145)}。总之一句话，人将最终告别过去的自己并成长为一个全新的主体。而当这个新主体再次回归到生产过程中去的时候，他又将变成“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9](P203)}，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推动人民美好生活往更好、更快实现。可见，自由时间的生成既

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推动它不断发展的动力来源。

再次，美好生活的人本取向要求必须使时间的利用更加充分且富有意义。美好生活作为对人民群众理想生活样态的表达，它既是实实在在、真实可感的，同时又是具有超越性的，它所指向的实际上是人的全面发展之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24](P11-12)}。因此，不管是物质上的丰裕还是自由时间的生成，它们实际上都是服务于人的发展这一价值目标的，为的是让人既掌握客体性的物质条件又占有主体性的时间条件，并在此二者的结合中来发展自身。然而，在美好生活的建构过程中，一些人却表现出了对物质财富的过分偏爱与迷恋，而对自由时间的价值和意义无法形成科学认识。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个人深陷“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漩涡无法自拔，将原本用来谋取自身发展的自由时间全都浪费在了无止境的享乐和无意义的空耗之上。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人虽然可以获得短暂的轻松体验、感官刺激以及愉悦感受，但随着这些内容的快速消退留下来的再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因为“当消费和享乐主义向每个人的极限发起挑战时，对真正自由、发言权和责任的需求就会被减少”^{[25](P242)}。这样一来，美好生活就发生了降格，从人的发展悄然滑向了单纯的物质享乐，从而消解了其本真意涵，照此发展下去，人非但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反而愈发地感到无尽的空虚、无聊、寂寞、郁闷和迷茫。

为了避免美好生活与其人本取向发生脱钩和偏离，如何充分地利用自由时间就成了重要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马克思“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的理论观点，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时间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供个人实现自我创造、自我充实、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而不是无事可忙的代名词，更不是随意挥霍的同义语，自由时间的占有度实际代表了个体人生意义的可实现度。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人避免沦为“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和“自己的肉体的奴仆”^{[12](P125)}，继而把目光回归于自身，集中到自我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创造上，由此切实体悟生活之美好。

三、社会时间视域下的人民美好生活构建

鉴于时间在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必须要以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理论为指导，做到驾驭时间与利用时间的统一，从而立足于时间的维度开辟美好生活实现的现实路径。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对时间之质的把握中激发人们的无限创造热情，夯实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对时间之态的转化中为人的各方面发展创造广阔天地，拓展美好生活的多重维度；在对时间之义的突显中使人从各种无意义的活动中主动撤离，深化美好生活的价值归旨。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地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并在其社会活动、社会享用以及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中实现美好生活。

首先，把握时间的属人本质，激发人的创造热情，夯实美好生活的物质根基。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它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在时间的每一个瞬间和每一个节点之上，实际所承载的都是人们对“当下现实”的改变和对美好生活世界的追求和创造，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时间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创造活动。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在劳动仍然带有谋生性质的条件下，人们对时间的理解更多的是把它视为一种协调和控制社会生产生活的工具，是规范人与限制人的东西，而不是自我本质力量的展开和确证过程，从而难以把握时间的本真意涵。尤其是在个别生产性领域当中，劳动时间更是意味着痛苦的“折磨”与漫长的“煎熬”，使得人们难以唤起自身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以一种敷衍和应付的态度来应付劳动和劳动时间，就更别提自身才能和创造力的发挥了，正如阿格尔所揭示的，人在时间面前“缺乏表现的自由和意图”^{[26](P493)}。照此发展下去，不仅生产效率难以提升，美好生活实现的物质基础也很难得以筑牢。

为了使人把握时间的实践本质,进而彰显人对时间的主体性地位,我们必须要在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认同感中使其成为时间的真正主人。第一,培育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时代最强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1](P46)}只有当劳动获得整个社会的赞许、肯定和尊重,人们才不会把劳动时间视作一种“自我牺牲”或是痛苦的“煎熬”,才会在劳动时间里得到自我彰显和自我肯定,创造伟大业绩。第二,优化和改善劳动环境,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体面劳动作为自由劳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表现,它主张为劳动者营造一个安全、舒适、人性化且有保障的劳动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每个人都将毫无后顾之忧地劳动,亦不必因任何外在压力而感到紧张。当个人身心完全处于放松状态时,他们才能去享受劳动,享受劳动时间。第三,提高劳动报酬,切实保障劳动者的经济利益。马克思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P286)},特别是在劳动仍具“谋生”性质的条件下,只有不断扩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建立劳动收入随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的长效机制,提高人在劳动时间中的收获感和满足感,才能使人切实领会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以上三个方面,人将由劳动的被动参与者彻底转变为主动实施者,时间也将约束人的力量变成自我施展的天地,从而激发出无限的创造潜力,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其次,转化时间的样态与结构,开辟广阔的自由天地,打开美好生活的多维面向。美好生活作为一个包含物质、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内容的有机体,它所力求实现的不仅是人民物质生活的丰裕,更是让每个人都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梦想成真的机会”以及“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P40)}。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以大量的自由时间作为前提和保障,因为只有自由时间里,人们才能从生产活动中抽出身来,才能开辟出新的社会生活领域,才能使自身的社会享用、社会发展和社会活动得到全方面开展。诚然,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人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但由于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的问题依然突出,这就使得人们所占有的自由时间量距离美好生活实现所要求的还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不遗余力地促进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的转化,让人民群众有机会、有条件去探索和开拓美好生活的多维面向,从而把生活塑造成一个“由多重、多向、多面和异质性的环节和内涵所构成的全面和丰富的立体性存在”^{[27](P72)}。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自由时间的创造归结为劳动时间的节约,他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19](P203)},而劳动时间的节约又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的,“真正的节约——经济=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力的发展”^{[28](P619)}。这就向我们表明,在新时代条件下,要想让人民群众掌握更多的自由时间,最为根本的还是要加速发展,“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4](P21)}。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我们也不能继续沿用过去那种以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型模式了,因为此种模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力水平,但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要素边际收益的不断递减,其结果将是经济的每一寸增长都必须以要素的过度投入和劳动时间的大量耗费为前提,继而造成物质的丰裕与时间的紧张的矛盾局面。而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为了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既有钱又有闲,我们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29](P16)}。通过发展新产业、拓展新领域、开发新产品、打造新业态,从而大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在更短的时期内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在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物质需求的同时实现自由时间的最大化,才能在确保增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产品供给的同时赋予人们更多自主发展空间。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30](P929)},在确保其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保证自由时间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再次，突显时间的超越性意涵，构筑人的精神家园，深化美好生活的价值归旨。美好生活通过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更多自由时间，它所要达到的实际是“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14](P137)}，换句话说，其价值旨向乃是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之维，这才是生活的真正美好之处。而不管是物的充裕还是时间的富足都只是作为美好生活实现的可能性因素存在的，其最终实现还取决于人们是否把时间切实用在了拓展自身和充盈生命之上。因此，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在于自由时间的普遍增长与享有，更在于自由时间的充分合理利用，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关注自由时间的量还得关心自由时间的质。只有当自由时间的自由意蕴被彻底发挥和释放出来以后，美好生活的深层次价值内涵才能得到深化。

在论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闲暇里的恣意放纵时，马克思指出，这一状况发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缺少教育”，这使得“他们可能把这些时间浪费掉，或者用这些时间干不正当的事情”^{[13](243)}。因此，要想使人们明智地利用时间，就必须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时间虚度现象，我们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人们科学充分地利用自由时间，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好生活的真谛绝不在于对个体“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过分迷恋，也不在于物质欲望、经济冲动和肉体享乐的无休止释放，美好生活的实质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表达。不管是让人民群众有“更满意的收入”还是“更好的教育”，或者是“更优美的环境”，其本意都是要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鲜活、更丰富、更多彩，变得积极且富有意义。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唤起每个人的自觉意识，才能激发其自我提升的内在要求，从而将自我需要的满足、才华的展示和境界的提升作为生活的至高准则，主动与“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生活方式划清界限，并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31](P190)}中去，从而将自由时间用在意义的追求而非欲望的满足上。通过对自由时间的充分合理利用，人们的收获感、满足感和幸福感都将得到极大增强，最终创造出自身美好生活。

四、结 语

当今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时间在人们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经济生活领域，时间直接意味着效益，人们总是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出最大的收益，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以便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奠定基础；而在日常生活领域，人们则又渴望能有足够的时间来供自己随意支配和享用，以便拓宽生活的面向，开辟美好生活的自由维度。由此一来，如何协调处理好时间就成了构建美好生活的关键。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指导，我们必须要通过自身本质力量的发挥来充盈时间、节约时间、转化时间，从而在确保物质丰裕的同时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最终使美好生活从理想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2] 张三元. 论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指引[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5).
- [3] 廖小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生成与实践指向[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2).
- [4] 陈新夏. 人的发展视域中的美好生活需要[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
- [5] 谢家书. 美好生活建设的中国道路[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10).
- [6] 高培勇. 深刻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经济学意义[J]. 经济研究, 2017(12).
- [7] 桑玉成. 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

- [8]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9] [古罗马]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周士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M]. 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1] 杨耕. 为马克思辩护[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12]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4] [美]卡罗尔·C. 古尔德. 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M]. 王虎学,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5]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6]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7] [德]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修订译本)[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8]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1] 习近平.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3]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5] [德]格罗·詹纳. 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M]. 宋玮,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26] [加]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27] 贺来.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28]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0]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1]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Marx's Theory of Social Ti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Good Life

LI Yang

Abstract: In Marx's theory, time is the process of human's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tself. In time, people take their "positive existence" to open up their "development space", and to shape their "life scale", thus making their life colorful and meaningful. At present, the good life we strive to build is aimed at making people live more abundantly and more meaningfully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satisfaction. Therefore, as far as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good life is concerned, Marx's time theory is still in a state of historical presence, including the subjectivity presence, the generative presence and the value presence. This requires us to grasp the quality of time, to tamp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the good life, to transform the pattern of time, to open up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the good life, to highlight the meaning of time and to deepen the value purpose of the good life.

Key words: Marx; social time; good life; material basis; life scale

(责任编辑 孙洁)